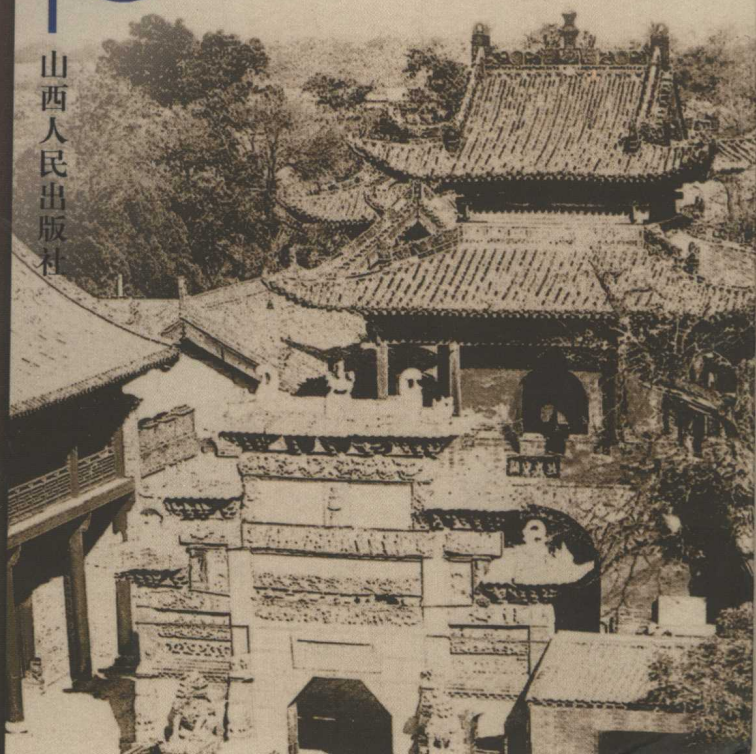


山西省政协《晋商史料全览》编辑委员会
运城市政协《晋商史料全览·运城卷》编辑委员会

晋商史料全览

运城卷

山西人民出版社



中国历史文献学
中国历史文献学
中国历史文献学

晋商史料全览

中国历史文献学



山西省政协《晋商史料全览》编辑委员会
运城市政协《晋商史料全览·运城卷》编辑委员会

晋商史料全览

运城卷

山西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晋商史料全览·运城卷/山西省政协《晋商史料全览》编辑委员会,运城市政协《晋商史料全览·运城卷》编辑委员会编.

—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06.7

ISBN 7-203-05626-0

I.晋... II.①山...②运... III.商业史-史料-运城市 IV.F72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063927 号

晋商史料全览·运城卷

-
- | | | | |
|---------|---|--------|-----------------------|
| 编 者: | 山西省政协《晋商史料全览》编辑委员会,运城市政协《晋商史料全览·运城卷》编辑委员会 | 网 址: | www.sxskcb.com |
| 责任编辑: | 张文颖 莫晓东 | 经 销 者: | 山西人民出版社 |
| 出 版 者: | 山西人民出版社 | 承 印 者: | 山西新华印业有限公司
新华印刷分公司 |
| 地 址: | 太原市建设南路 15 号 | 开 本: | 787mm × 1092mm 1/16 |
| 邮 编: | 030012 | 印 张: | 350 |
| 电 话: | 0351-4922220 (发行中心)
0351-4922208 (综合办) | 字 数: | 5500 千字 |
| E-mail: | Fxxz @sxskcb.com (发行中心)
Web@sxskcb.com (信息室)
Renmshb@sxskcb.com (综合办) | 印 数: | 1-3000 (套) |
| | | 版 次: | 2006 年 7 月第 1 版 |
| | | 印 次: | 2006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
| | | 定 价: | 800.00 元 (全套) |
-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序



1

总 序

山西省政协主席 刘泽民

全面深入挖掘晋商史料,编纂出版《晋商史料全览》是第九届山西省政协的一项重要工作。从2003年列入计划以来,经过全省各级政协特别是各级政协文史委的共同努力,这套系列丛书将要陆续问世了。应该说这是一件总结前贤、惠泽后人的事情,也是体现政协特点、塑造政协形象的工作。

大凡征编出版史料,是以研究历史、总结经验和教训、警示后人为目的的。晋商在中国历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明清时期,山西人多地少,土地贫瘠,虽有盐铁煤炭等资源优势,却由于生产力条件所限,长期得不到开发利用。明代山西商人抓住朝廷为北方边镇筹集军饷而实行“纳粮中盐”的开中制的历史机遇,走出口外,走向全国,一步步把生意做大,占据和分割了全国市场,甚至走向海外,形成了海内最大的商帮,居徽商、粤商等十大商人集团之首。晋商现象是山西乃至中国特定历史时期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各方面发展的一个综合反映。在经济方面,晋商开辟商路,促进了各地区间的经济联系,推动了各地城市集镇的兴起及国内外贸易市场的建立和发展。所谓“先有曹家号,后有朝阳县”;“先有复盛号,后有包头城”;“先有晋益老,后有西宁市”等民谚都足以说明这一点。它首创票号,开异地汇兑、转账结算之先河,汇通天下,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发展,为近代银行业的建立奠定了基础。它积累了丰富的商贸经验,创新了经营体制,如“酌盈济虚、抽疲转快”,如两权分立、掌柜负责制、设立人身股等,为现代经济的发展和进步提供了一定的借鉴。在文化方面,它创建了灿烂的晋商文明,以其开拓意识、敬业精神、诚信理念、经营策略、管理方法等晋商精神和与之相适应而形成的建筑风格、戏曲艺术、饮食文化、道德伦理、社会风尚等,丰富了民族文化,成为中华民

族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至今仍广泛影响着人们的精神面貌和社会生活。

晋商研究首先是经济研究,但又不完全是经济研究。晋商文化的内涵非常丰富,具有多学科、多角度、多领域的研究价值和审美意义。综观国内外晋商研究历程,已有近百年的历史。早在20世纪40年代以前,晋商的创新业绩就引起了国内外有识之士的关注,一些赞成实业救国的学者开始整理晋商文化遗产,并出版了相关学术专著。由此可见其重要性和必要性。历史是一面镜子,通过对历史事件和现象的探究和分析,可以为我们提供很多可资借鉴的经验和思想。这也正是我们今天挖掘晋商史料,编纂出版《晋商史料全览》目的之所在。归纳起来,我想其重要意义大约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存史,抢救和保护历史文化遗产。明清晋商已消亡近百年,民国晋商也过去了50多年,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当事人的离世,直接反映晋商商人和家族的史料如族谱家乘、墓志碑文、传记家训、店规行规、会计账簿、当票汇票等文献和实物在不断流失;随着城市的改造和建设,晋商在全省及全国各地留下的遗址遗迹如商号店铺、作坊宅院、庙宇会馆、碑刻楹联等在不断被拆除或损坏;随着各地的经济建设和发展,历史上晋商活动过的商业城镇、商品集散地、商业口岸、商路要地、渡口、驿站所在地等在不断消失;随着晋商后人的去世,一些口碑史料也在不断被带走,留下无法挽回的遗憾。鉴于这种情况,我们组织搜集整理晋商史料,就带有抢救历史文化遗产的性质。这项工作不但很重要,而且很紧迫。

二是资政,促进经济社会的发展。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正处于一个战略机遇期,我们要实施“十一五”规划,坚持改革,扩大开放,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发展旅游业,调整结构,促进经济发展;我们要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我们要培育新晋商,促进多种经济共同发展……这些都需要借鉴历史经验和教训。晋商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形成的经营哲学和理念,晋商积累的经营管理策略和技巧,晋商创立的组织制度如行会制度、企业制度、财务会计与核算制度等,都有可资借鉴的丰富内容。特别对山西来说,晋商史料的搜集整理,可以促进景点景区的

序



开发和建设,促进旅游文化产品的开发和档次的提升,为进一步丰富文化旅游资源,促进山西人文资源向旅游资源转变,促进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服务。

三是育人,弘扬民族精神,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晋商500年的兴衰史是一本不可多得的教科书,晋商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晋商精神是民族精神的重要体现,是山西宝贵的文化遗产。晋商精神中勤劳俭朴、团结互助、诚信敬业、开拓进取等思想理念是伟大的中华民族精神的灵魂。如晋商以诚信闯市场,以诚信创大业,“诚招天下客,义纳八方财”的大生意经,对我们今天发展信用经济,构建信用社会,建设信用政府,争做信用公民,就有着很好的借鉴作用。我们可以从晋商史料中发现晋商精神的这些亮点,加以总结推广,使之发扬光大,为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服务。同时我们还可以从晋商的兴衰成败中获得思想的启迪。

四是为晋商研究提供史料基础,促进晋商研究工作向纵深发展。晋商研究目前已成为受到省内外相当关注的一个重大课题,但就目前晋商史料的发掘来看,却相对滞后。历史上晋商遍布全省全国,但晋商史料的发掘却主要集中在晋中一带,远远不能反映晋商的群体历史。在研究方面,有关专家虽然已经作了较深层次的开拓,著作论文也很多,但许多著作所引用的史料却大同小异,缺乏新的历史资料,“炒冷饭”的现象和问题比较突出。史料征集工作如果不能有大的突破,晋商研究就很难再有大的发展。因此,现在迫切需要广泛、全面、深入地搜集晋商史料,以促进对晋商文化内涵的进一步挖掘,将晋商研究引向深入。

文史资料工作是人民政协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新时期对政协文史资料工作提出了新的要求。搜集整理晋商史料,编辑出版《晋商史料全览》,就是一项适应经济社会发展要求,符合山西政协工作实际的举措。首先是省市两级政协和多数县区政协都有文史资料委员会,有专职或兼职干部,其主要业务就是征集和利用文史资料。其次,各级政协有广泛联系社会各界的优势,只要充分发挥广大政协委员和社会各界的作用,就



可以动员一支很大的力量。第三,各级政协相对于政府来说,位置比较超脱,具体事务性工作少,三级政协上下联动可以取得很好的协作效果。从上述几层意义上讲,这是历史赋予我们政协的一项使命,也是我们履行职能的具体体现。因此,我们把这项工作列入工作计划,集中了上下三级政协一定的人力财力共同来完成这一庞大的系统工程。

晋商的发展是不平衡的,其兴衰成败是一个历史的发展过程,具有连续性和继承性,到明清时期达到极盛。当时晋商的足迹遍布于全国以至海外许多地方,特别是在省内,无论大小城镇,甚至偏远山区,都有规模不等的晋商产生,当时就形成了平阳帮、蒲州帮、潞州帮、泽州帮、汾州帮、太原帮、大同帮、忻州帮、代州帮、崞县帮等商帮。像临县这样的贫困大县,都曾有过繁华的碛口镇;像右玉这样的穷县,也曾有过兴盛的杀虎口……可见史料十分丰富。但如前所述,目前晋商史料的征集大多仍局限于文字资料,局限于明清时期,局限于晋中地区,这是很不够的。因此,我们希望进一步拓宽晋商史料收集的视野和范围,力求收集得更广泛一些,全面一些。因而也把书名定为《晋商史料全览》。《晋商史料全览》是一套大型系列丛书,分专题卷和地方卷。地方卷为综合卷,11个市各成一卷,按专题编排。《晋商史料全览》的所谓“全”,是相对而言,是尽力而为,事实上也不可能这一次就把晋商史料全部搜罗殆尽。我们力求做到“全”,一是指在时间上重点突出,主要收编明清和民国时期的晋商史料;二是指在地域上全方位,尽可能把全省各个市县及外省市有关地区的晋商史料收编进来;三是指在角度上多侧面,包括晋商的人物、家族、行业、字号、商埠、码头、宅院、店铺、商路、文献、碑刻、传闻、风俗和其他社会活动事迹等内容。

史料工作,是史学范畴最基础的工作。就像盖楼一样,基础必须扎实牢固,否则楼房就会坍塌。史料工作这个基础打不好,就会给史学研究造成错误。因此,我们在搜集整理晋商史料工作中,坚持了一个总的精神,就是重在存史,贵在挖掘,急在抢救。重在存史,就是强调严肃对待历史,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保证史料的真实性。对所搜集到的史料,我们都加以认真细致的整理、鉴别和考证,力求做到求实存真,一丝不苟,以真实

地记录历史、反映历史的本来面目。贵在挖掘,就是要求我们的文史工作者深入下去,发现和搜集各地具体的史迹、史料,像考古学家一样,从历史文献、文物古迹和民间口碑口述中深入细致地发掘学术界尚未公布的史料。这像采矿淘金一样,是很艰苦细致的工作。急在抢救,就是要抓紧时间,特别是对那些年事已高、有“三亲”(亲历、亲见、亲闻)资料的老人,抓紧进行访问;对一些很容易失传的老照片、票据账簿、手抄家谱和残碑碑文,抓紧搜集回来;对一些正在损坏的晋商店铺、宅院、码头遗址,抓紧拍摄下来。这样,经过几年的努力,我们终于完成了史料征集工作,征集到上千万字的晋商史料。

在《晋商史料全览》编纂过程中,我们要求所有编纂人员要树立责任意识、使命意识和精品意识,力求做到“三个体现”,体现史料性,体现晋商精神,体现完整性;力求做到“三个突出”,突出晋商名人,突出名老商号,突出地域特点;力求把好“三关”,把好政治关,把好史实关,把好文字关。一句话,我们力求向社会提供一套内容丰富,史料价值高,实用性强,好看可读的精品图书。我们尽力做了我们应该做的事情,现在这套书就要陆续出版了,我们期待着读者的评判。

编纂出版《晋商史料全览》的基础工作是搜集整理史料,而搜集整理史料的大量工作在市县。在几年的工作过程中,各级政协领导和文史工作者都做出了艰辛的努力。特别是基层政协文史委的同志,在人员少、经费紧、工作条件差的情况下,不辞劳苦,甘于寂寞,付出了许多心血。借此,我以编委会的名义,向他们表示深深的敬意和谢意,并向支持我们编纂出版这套图书的各级政协委员和社会各界朋友及山西人民出版社编审人员表示感谢。

由于时间仓促,再加上我们工作水平还不高,本套图书一定有不足和疏漏之处,敬请读者不吝赐教。

是为序。

2006年5月

本 卷 序

运城市政协主席 安永全

序



7

晋商文化作为中华民族厚重历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目前已引起国际国内经济史学界的广泛关注。然而晋商历史远不是明清叱咤风云五百年的短暂一瞬,而是与五千年华夏文明一脉相承,源远流长的。据考证,“贾”出于“鹽”。“鹽”,一义为古盐池名,《说文·盐部》:“鹽,河东盐池也。”另一义为颗盐,亦作苦盐,即河东盐池所产之盐。日本学者宫崎市定研究指出:中国最古的文明,实兴于河东盐池附近。夏、商、周三代国都大体都位于河东池盐的消费地区,盐池可谓三代文明的经济基础。中国商业的起源,同盐有着密切的关系。最初的重要商品就是盐,中国最早的商人恐怕就是晋商。

为了探求晋商文化源头,展示晋商的辉煌历史,我们从浩如烟海的古籍史料和民间口碑中发掘整理出古代河东商帮创业和经营的鲜活故事,汇集《晋商史料全览·运城卷》一书,以再现河东商帮纵横捭阖、驰骋天下的烈烈雄风,印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长春同志总结的“节俭勤奋,明理诚信,精于管理,勇于开拓”的晋商精神,感悟和反思先祖“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浩然大气,以史为鉴,面向未来,重塑晋商形象,彰显晋商精神。

—

运城古为河东,以雄踞黄河之东而得名。这里,汲巍巍中条之灵气,纳滔滔黄河之膏泽,接皑皑盐湖之熏风,承殷殷后土之深情,襟山带河,钟灵毓秀,历史悠久,人文荟萃,乃帝王之乡、华夏之祖、炎黄之根。

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垣曲县寨里村的“中华世纪曙猿化石”,把人类与灵长类共同的祖先——曙猿的活动时间推至 4500 万年

前。这一伟大发现,否定了“人类起源于非洲”之说,同时也将人猿进化向前推进了 1000 万年。黄河岸边芮城县境内的西侯度文化遗址,证明不在 180 万年前,河东先民即开始用石片加工制造工具,首开人类使用石器之先河,用火烤熟食物,燃起人类文明的第一把圣火。境内现存新、旧石器文化遗址 126 处之多。国家前文物局局长、著名学者王冶秋曾咏诗叹曰:“晋南文物不寻常,史迹绵延万古长。猿人更有猿人早,哪论唐虞与汉唐。”

传说中华始祖女娲引绳于泥,抟土造人,化育自然,繁衍人类。轩辕黄帝“采首山之铜,铸鼎于荆山之下”;会盟诸侯,败蚩尤于涿鹿之野。后稷教民稼穡,自此农耕文明兴起。嫫祖养蚕缫丝,始有绫罗衣锦及世。《世本》、《帝王世纪》等典籍记载:“尧都平阳(今临汾),舜都蒲坂(今永济),禹都安邑(今夏县)。”

自古河东人才辈出。古代第一位圣人传说、春秋霸主晋文公、战国时代与孟子齐名的荀况、三国蜀将武圣关羽、东晋文学家郭璞、初唐四杰之一的王勃、八仙之一的吕洞宾、晚唐大文豪柳宗元、宋代名宰相兼史学家司马光、元代戏剧大师关汉卿、清末“戊戌六君子”之一的杨深秀等一批名垂青史、彪炳千秋的文杰武俊。

著名历史学家李元庆指出:“河东文化源远流长,在华夏文明史前时期,河东是中国原始人类聚居的集中地带,积淀了极其深厚的原始文化层。在华夏文化起源及其发展历程中,河东是华夏先民的活动中心,华夏文明的直接源头;在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的春秋战国时代,河东是新兴的封建势力的策源地,晋与三晋文化的主要载体;进入封建社会以后,河东文化的发展构成了中国封建文化历史长河中的一股强流,集中再现了中国封建文化的本质特点。总之,河东地区是中华民族的摇篮,河东文化是中华文化的缩影。”著名考古学家苏秉琦教授则说:晋南是“中华民族总根系”中的“直根”。



二

运城古为盐贩之泽。春秋称苦城或盐邑，战国称盐氏。自秦始皇置河东郡始，下迄汉、唐、宋、元、明、清，或称司盐城，或称潞(村)，或称道，或称盐运之城，已沿袭两千余年。所谓“地效灵，天挺秀，爰有育宝之区；前创始，后增修，斯有凤城之建。运治非盐池不立，盐池非运治莫统也。”所谓“凤城”，是指元顺帝至正十六年(1356年)八月，河东盐运使那海俊德在潞村营建城池，因其形似凤凰，取名“凤凰城”。后因盐运司进驻，遂改名为“运司城”，又名运城，沿用至今。

盐之于商，自虞舜起。“南风之薰兮，可以解吾民之愠兮；南风之时兮，可以阜吾民之财兮。”这一体现虞舜施政策略、民本精神的《南风歌》，以盐“可以阜财”而成为中国最早的商业思想。同时，史书中多有舜经营池盐、农渔产品和陶器制品的记载。《墨子》称：舜“灰(贩)于常阳”；《孟子》曰：舜“迁(贸迁)于负夏”；《尚书大传》载：舜“贩于顿丘，就时负夏”；《帝王世纪》载：舜“迁于负夏，贩于顿丘，债于传虚”；等等。中国人民大学教授、中国伦理学会常务副会长许启贤先生则对虞舜经商的诚信态度推崇备至。他说，舜在河滨做陶器时从不粗制滥造，十分重视质量，所以人们都愿意和他在一起，“一年而所居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史记·五帝本纪》)。因而也就有了远古时期山西南部“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易·系辞》)的商业繁荣景象。虞舜当为中国商业之鼻祖。

春秋战国时期，晋文公以“沃饶而近盐”的地缘之利，实行“轻关易运，通商宽税”的政策。晋悼公宣布“公无禁利”，促进了商业的发展。因而，绛邑富商“其财足以金玉其车，文错其服，能行诸侯之贿”。晋公子计然以“积著(贮)之理”的经商之道被范蠡尊以为师。“晋之大狙”(马市交易经纪人)段干木(芮城人)亦被魏文侯尊为老师。活跃在河东的著名大商贾猗顿，原为鲁国一穷士，“用盐盐起”(《史记·货殖列传》)，东向齐鲁，西向秦蜀，“十年之间，其息不可计，货拟王公，驰名天下”(《水经注·涑

水》),世称“陶朱猗顿之富”。太史公称赞道:“长袖善舞,多财善贾,其猗顿谓乎!”猗顿可以说是晋商的开山始祖。

隋唐时,河东商人从蒲坂、浞津(今芮城)、虞坂(今平陆)、绛州、垣曲等盐运古道出发,以“驴骡牛马之运,西出秦陇,南过樊邓,北极燕代,东逾周宋”(《全唐文》卷586),使河东池盐(又称潞盐)行销华夏二十八州,成为国家赋税收入的重要来源之一,军需边饷皆依赖之。柳宗元说:“猗氏之盐(即河东池盐),晋宝之大也。”

唐开元时,河东绛州作为漕运码头和商业重镇,即为全国六大雄城之一,舟车辐辏,商贾云集,有“运不完的绛州城”之誉,其商业之繁荣可见一斑。据《太平广记》载:唐时,河东闻喜人裴佑先,在边境贸易中“货殖五年,致资财数千万”。

北宋雍熙三年(986年),国家实行盐引制,又称折中制,即商人输粟于边,授以盐引,再以引领取池盐。至此河东池盐得以私营,晋商序幕由此拉开。山西作家王进在《昨天的晋商与镖局》一文中指出:宋代,位于河东的盐池就成了天赐晋人之利藪,涌现出了一批拥财千万的盐商。运城因盐勃兴,成为天下税赋渊源,巨富云集,室庐连并,楼阁辉映,极为繁荣。

13世纪时,河东蒲州(今永济,古为京畿之地,又曾作为中都,与西京长安和东都洛阳齐名,是全国六大雄城之一)“富庶尤甚,商贾争趋”(《松窗梦语》),在威尼斯商人马可·波罗的笔下已是一个“非常大的都会,一个非常大而且非常重要的商业和工业城市”。“这里的商业相当发达……这一带的商人遍及全国各地,获得巨额的利润。”(《马可·波罗游记》)。马可·波罗还特别提到:在晋秦豫黄河三角地区有“大批的商人从事广泛的贸易活动”。明时,这里更是“甲宅连云,楼台崔巍,高接睥睨,南廓以上,别墅幽营,贵家池馆,绮带霞映,关城所聚,货到队分,百贾骈臻”(《蒲州府志》)。当时全国较大的商业城市有33个,山西有3个(太原、平阳、蒲州),蒲州是其中之一。

明初,为防御外族入侵,明王朝沿长城一线由东向西屯兵戍守,构成了“九边”(辽东、蓟州、宣府、大同、偏关、延绥、宁夏、固原、甘肃)防卫体



系。为保证军饷供应,推行明王朝“开中制”。这是为了军事目的而创设的一种招商代销制度,实质是商人以力役和实物向封建王朝换取盐的专卖特权,以获取高额利润。“开中制”的具体内容包括纳粟、纳马、纳铁、纳帛、纳草等多种项目。山西位于长城内侧,“九边”之中的大同及偏关均在山西境内,宣府也邻山西。于是河东乃至山西商人,以拥有盐池和“极临边境”之优势,捷足先登,纷纷进入北方边镇市场,集粮、盐、布经营于一身,在瞬息万变、风云诡谲的商海中迅速崛起。据《长芦盐法志》卷2《沿革》记载:“明初,分商之纲领者五:曰浙直之纲,曰宣大之纲,曰泽潞之纲,曰平阳之纲,曰蒲州之纲。”所谓“纲”,是长芦盐商中以籍贯区分形成的一种早期行帮形式。长芦盐商五纲中,山西占四纲。河东蒲州帮占据一席之地,成为晋商劲旅。

明弘治五年(1492年),明王朝改“开中制”开中纳粟为“折色制”开中纳银后,经营解州池盐“盐利倍增”,盐商人数竟达500余家(《河东盐法备览》卷6《运商门》)。随着盐商的增加,竞争加剧,商人获利大为减少。此时,河东商人审时度势,改变经营方针,实行战略转移,盐业经营从边镇转向各大盐区;经营项目由盐、粮、布转为百业并举;活动范围由纳粮开中地区转向全国各地发展;经营方式上出现了行帮、伙计制等组织形式,增强了河东商帮的竞争力。

明中叶,晋商已称雄于全国商界,而河东蒲州帮更是盛极一时,富商巨贾众多,尤以官商联袂的蒲州张氏家族和王氏家族最为显赫。张氏在元代由解州盐池之南迁居蒲州,传到张允龄,“服贾远游,足迹半天下”。其子张四维于嘉庆三十二年(1553年)中进士,历任编修、翰林学士、礼部侍郎;万历十年(1582年)出任内阁首辅。张四维之父张允龄及弟张四教经营盐业,大获其利,富甲天下。

张氏的姻亲王氏是明初由汾阳迁居蒲州的,传至王馨,官居邓州学正,其子王现、王瑶兄弟都是以商起家,贸易四方。王瑶在正德年间为两淮大盐商。王瑶生三男五女,其三子王崇古于嘉靖二十年(1541年)中进士,历任刑部主事、陕西按察使、河南布政使、右副都御史,以兵部右侍郎总督宣大山西军务。他的二姐嫁给长芦盐商张允龄,即张四维之母。

王崇古、张四维舅甥一个在外手握兵权，为一方诸侯；一个在京位高权重，为朝廷重臣，内外呼应，家族势力雄大，可谓权倾一时。隆庆四年（1570年）九月，蒙古俺答汗之孙把那汉吉奔蒙降明。在朝议过程中，王崇古力主以此为契机，“封俺答，定朝贡，通互市”。张四维联络朝中官僚，推波助澜，于隆庆五年（1571年）三月实现了蒙汉“议和互市”。《明史·王崇古传》载：“崇古乃广召商贩，听令贸易。布帛、菽粟、皮革远自江淮、湖广，辐辏塞下……自是边境休宁……数千里军民乐业，不用兵戈，岁省费什七。”这一议和互市，不仅确保了明时长城沿线较为长期的和平，而且明蒙之间广泛开展了通商贸易，为商人梦寐之所求。于是晋商蜂拥而至，以内地之缎、绸、布、绢、棉花、针线、篦梳、米、盐、糖、果、茶、梭布、水獭皮、金，交换蒙古牧民的马、牛、羊、骡、驴、马尾、羊皮、皮袄等，大获其利。《明实录》卷558卷载：“大同杀虎堡……汉夷贸易，蚁聚城市，日不下五六百骑。”

在此背景下，“四维父盐长芦，累资数十百万，而崇古盐在河东，相互控二方利。”（明·王世贞《嘉靖以来内阁首辅传》卷7）张、王二姓控制着长芦和河东盐区。御史邵永春视察河东盐运时，“言盐法之坏由势要横行，大商专利，指四维、崇古为势要”（《明史》卷219《张四维传》）。

张、王两大家族，在商界和官场的势力还远不止此。张四维的祖姑父沈廷珍也是大商人。张四维二弟张四端妻李氏，其祖父李季曾在“兖豫之间从商”。张四维五弟张四象，前妻王氏、续妻范氏均为商人之女，范氏祖父范世逵是著名盐商。张四维之子定征娶曾任兵部尚书的杨溥之孙女，张四维之女嫁内阁大臣马自强之子马淳。而马自强之弟马自修又是陕西富商。王崇古长姐所嫁侨居蒲州的沈家，也是几代为商。总之，蒲州张氏和王氏是有极大势力的官宦集团和商人家族。

此外，明代河东蒲州一带还有许多著名商人，如商于沧州，后人资为官的展玉泉；商于长芦，“动辄万金毫不在意”的王海峰；经商“善于时轻重，其产遂饶”的李仲节；“迁车服贾”，“携巨资游关陇、扬越间”的沈江（猗氏人）；商于辽东“几逾十年”，“资既饶裕”的王玺（安邑人）；“货殖江湖，遂成大贾”的孙员（安邑人）；商于西宁，“尝鬻木棉数万斤”的赵统（绛



州人);还有“家世业商”的徐山泉、“秦陇业商”的郭震、商于天津的王三鉴等等。他们“西到秦陇甘凉瓜鄯诸郡,东南达淮海扬越,西南则蜀”(明·张四维《条麓堂集》卷28),东走辽东,北及口外,秉德为商,以义制利,贸迁四方,贾道通达。至此,河东商帮独领风骚,称雄于九州。

明末清初,山西作为“商贾之途”、“财赋有出”之地,商业迅猛发展。清顺治六年(1649年)起,清王朝一改明代强迫盐丁徭役劳动的官办生产办法,实行了“畦归商种”这一新的经营形式,河东盐池改由商人经营,商业资本开始向生产资本转化。运城、安邑及各地商人及富户纷至沓来,投资盐业生产。至此,商人逐渐分化为专事生产的坐商和专事运销的运商。坐商雇工生产,坐地收银,并对畦地拥有合法占有权。畦地出现商品化。这些变化,扩大了河东盐的内销外运,占有秦晋豫三省119个州县的广阔市场,沟通了与各地之间的经济联系,促进了区域性商品市场的形成和发展。雍正、乾隆年间,河东盐池坐商达420余人,其中四大坐商绛县槐泉王氏、汾城南高刘氏、运城姚氏和杜氏均为钟鸣鼎食之家、锦衣玉食之族。绛县槐泉王氏家族,经营盐业百余年,鼎盛时期,在河东盐池拥有5个盐场,在河南宝丰县、山西绛县拥有土地上万亩,另在河南宝丰、山西曲沃开有各种店铺20余家,每年纯收入数十万两白银。

河东的平陆,“地当水路之冲,值八省通衢,自虞坂以下,依山凿径,绵延百余里,扼关陕咽喉,由晋入豫者道所必经。故皇华冠盖之络绎,仕宦商旅之辐辏,纷至沓来,不胜纪记,而三晋嵯商辇运盐斤,尤当孔道”(光绪《平陆县续志》卷下《艺文》)。晋南“陆路则方轨并进,南下风陵渡河即中州之陕洛,关中之三辅,四通八达,无往不宜”(徐继畲《松龛全集》文集卷1《尧都辨》)。河东运城既是巡盐治所,牢盆聚集,商贾辐辏,“往来者莫不道经于其地”(民国《安邑县志抄本》卷15)。

“康乾盛世”、“乾嘉盛世”时期,河东商帮仍为晋商劲旅,足迹遍及全国各地,经营范围涉及粮、油、糖、茶、烟、酒、盐、醋、瓜果、酱菜、糕点、棉、铜、铁、药材、皮革、书籍、牲畜、煤炭、石膏、农具、布匹、丝绸、针线、典当、钱庄等等。

清朝末年,河东商帮也不乏才略雄俊之士。河东荣河商人傅庆泰(傅